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DE ZAOQI TANSUO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早期探索

王增智 / 著



社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DE ZAOQI TANSUO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早期探索

王增智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虞 晖 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 王增智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01-011035-6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2346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MAKESI ZHUYI ZHONGGUOHUA DE ZAOQI TANSUO

王增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70千字

ISBN 978-7-01-011035-6 定价:3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近年来人文社科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2004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关于这个主题的探讨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之势。从近年出版的专著和期刊文章来看，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形容这个研究领域的热度，一点儿也不为过。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日益结合”^①的渐进过程，“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时代是以问题为标志的，时代不同，因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作为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具体实现形式根据不同问题的解决途径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原理的“相结合”，其具体实现形式取决于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换句话说，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途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现实形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在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历史阶段上的具体现实形式，并且，这一探索还会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延伸。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而展开，但却总是以中国道路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作为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浓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中国建设和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浓缩。

就中国革命、建设道路选择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际上共享了一个实践范式：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前者是在没有任何革命和建设经验情势下的仿效和探索，后者是探索中的创新。但归根结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①，“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②但这一实践范式却是历史性的存在，值得后人们去研究。

这部书的原本是王增智的博士论文。对他的博士论文，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作了系统的、深入的梳理，独具风格，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别样理解化作为理论工具来观察国民革命的进程，这是其突出特点，也是一大优点。本书也是根据这种架构，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在实际革命运动中的“相结合”为切入点而展开。经过修改、补充后的这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1921—1928）》，将原来的博士论文内容扩充到对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并附上了一篇曾被大量引用的重要文章，供读者对作者观点更好地理解。这本身说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探索的深入，从而彰显了其追求的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中，关于分期问题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个焦点。我们整合了学界的观点后，根据“日益结合”的主题及其体现形式的不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划分为六个阶段：传播期（1899—1920年）、早期探索期（1921—1927年）、成熟期（1928—1938年）、拓展期（1939—1956年）、挫折期（1957—1978年）和发展创新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王增智的博士论文承担了早期探索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自己的革命之路。经历艰辛，他最终不负厚望，出色完成了任务，这部书就是最好的证明。

常言道，文如其人。王增智的这部书正如其人，思辨力强，严谨认真，朴实无华。他在我至今招收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中算得上是佼佼者，勤奋努力，追问慎思，爱从细节发问，使一个“旧问题”焕发出新光芒；在攻读博士学位三年间发表了十余篇核心以上的文章，并产生了一定影响；荣获四川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称号。读他的书，你不仅会得到丰富的知识和严谨的逻辑陶冶，还会感受到他对生活的别样理解。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个“个体生存体悟”概念，对我们习惯于或喜欢从某种大的理论来谈论生活内涵的思维范式提供了深刻的新启迪。这其实反衬了作者自己的生活境遇。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政党也是如此。当下，我们党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认识，恐怕也是这一“生存体悟”的结论。

总之，这部书视野开阔，立意新颖，论证有力，历史性与逻辑性交织统一，思想性和理论性融于一体，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著作。我相信这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书，会产生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也会进一步促使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

王国敏

2012年4月于成都

目 录

序	1
导 论	1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认识	1
二、对本研究中几个相关问题的说明	5
第一章 “五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	11
一、“找”在思想上的激荡	14
（一）“找”之动因——觉醒后的反应	16
（二）“找”之途径和内容	27
二、“南陈北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34
三、马克思主义在辩论中深入传播	48
（一）“问题”与“主义”之辩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49
（二）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64
（三）理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能？	6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诞生	75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界定	75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应具有的特征	76

(二)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80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85
三、建党时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	97
第三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世情和国情的探究	108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情势的判断	109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 运动的影响	112
(二) 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策略由“互竞”变为“协同”	115
(三)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16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识别	118
(一) “半独立的封建国家”	118
(二) 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	122
(三) 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	126
(四)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错误观念	127
(五) 中国农民的穷困和手工业者的破产	132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实践探索	135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策略和任务	139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48
(一) 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相关理论问题	148
(二)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领导作用	153
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59
(一)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160
(二)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	170
三、国民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破裂的原因	191
(一) 两党所代表的阶级不同, 从而决定了其革命目标迥异	192
(二) 两党革命性质和目标之不同决定了其革命进程之不同	196
(三) 革命目标之不同决定其革命对象和动力来源之不同	197

(四) 幼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情认识不深、缺乏必要的革命 经验和部分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加速了国民革命时期民主联合 战线的破裂	202
第五章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经验总结	204
一、对“找”与“送”的审视	206
(一) 关于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	209
(二) 关于对国民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认识	211
(三)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武装斗争的问题	215
(四) 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	219
(五)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 中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及其策略方针	221
(六) 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的作用	222
二、走向中国革命新道路	228
(一) 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相关问题	228
(二) 中国革命新道路新在哪儿	236
附录 “走俄国人的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41
主要参考文献	255
一、专著类	255
二、报刊文章和论文类	263
后 记	267

导 论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认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讨论，学界现已呈现纷繁局面。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颇为丰富的命题，主体论、客体论、目的论、工具论、价值论以及方法论等都被整合在它的范畴里，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能泛化只能具体化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的提出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可知，从宏观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包含了“一个基本原则”和“三个基本要求”，即“相结合”原则^①和“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及理论表达的民族性和大众化；从微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包含了：1. 谁来“化”，即主体问题。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2. 用什么来“化”，即理论工具问题。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而不是某个具体结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拓展和丰富，但其基本原理并没有改变。3. 怎么“化”，即方法

① 毛泽东先后将“相结合”界定为党的一贯思想和基本原则。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或机制问题（下文重点阐释）。4. 为何“化”，即目的问题。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化”来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也就是“化”的落脚点。5. “化”之基点，即客体或国情问题。这里强调的是“化”之出发点，即“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①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情不仅仅是指中国国内的情势，还包括国际情势。6. “化”之总结，即将“化”之经验提升为理论。7. “化”之价值，即价值论问题。这里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的意义所在（价值与目的的区别在于：目的主要强调既定任务的完成，而价值除了涵盖完成任务之外，还强调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认知精神和心理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要包含：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文化或精神价值）。由上述七点观之，“相结合”不仅是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实现自己理想目标的现实转换，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基点，完成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为目的而演绎出的一幅生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化”，即“化”的机制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基于中国国情，通过党的议事程序和组织原则，形成和制定解决各个历史时期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后党的地方组织再根据这一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出因地制宜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措施，并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凝聚群众的力量予以贯彻落实；在贯彻落实中检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够推动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最终将正确的实践经验通过理论的抽象提升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下一步行动的指南，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如此产生的，其核心在于解决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现实问题。其实，这一机制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提出来了。如恽代英在1920年就提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适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③三年后，李达也表达了相同

① 参见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习近平在《求是》杂志（2011年第6期）上撰文《关键在于落实》中谈及这一机制问题。

③ 《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的观点：“中国无产阶级对于目前的政治运动，究应怎样决定，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画”，但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之社会革命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的程度”，可以制定出一个政策来。^①1926年蔡和森也认为，“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机关凝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②这里有两个深层次问题需要说明：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必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本土化既涉及理论概念的对接，更涉及应用。也就是说，只有将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为党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并予以贯彻落实时，本土化才渐次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用切实的行动来解释理论，而不是在理论所具有的“束缚”下从事行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把自己界定为“行动党”、“革命党”和“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③是为佐证。本土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既包括对外来理论的选择，又包括对外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二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相结合”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或措施与办法的认知，并不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后者则是原理本身的内涵。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对基本原理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责任，二者不能混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其真正目的在于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只是这一探索进程中的经验总结，随着探索的不断延伸，这一经验总结也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诚然，为了指导进一步实践，经验总结也是必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总结经验和继往开来是推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宝。历史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改

① 《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②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电子版）：<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27/66627/4489290.html>。

造中国现实，以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和发展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根据国情实际制定和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情势。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必须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境况，因为这种变迁反过来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一致的。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绝不是某个人或几个领导人意志的体现，是全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在现代国家里，体现集体意志的方式是组织的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在其全体会议上制定通过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全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进而中国共产党人贯彻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在贯彻自己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意志。而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不是某个人或几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个集体组织（正文第二章详解）。

当然，领袖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提议者，而这个提议者也只有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集体的意志方能起到改变历史的作用。我们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在此意义上讲的。这里既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又说明了毛泽东在这一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在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政党里，只有将自己的真知灼见上升为全党集体的意志才能以集体的力量发挥作用。如果毛泽东同志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把自己的真知灼见上升为党集体的意志，那么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建议再怎么正确也还只是个人的建议，可能对改造中国面貌起不了多大作用（毛泽东个人的经历就佐证了这一判断）。组织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依托，改造中国绝不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断或某些群体一时的聚合运动，而是需要有组织纪律性的坚强领导力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是由不同群体组成的，而每一群体对推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

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者、国情的把握者和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构建者以及错误的矫正者。党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中国国情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文本的构建者和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宣传者。党员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内的群众基础。他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者、宣传者和贯彻实施者。没有党员群众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大打折扣。普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形象先进与否，党在非党员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崇高与否的直接表征器，对党的群众基础的广泛性和党执政的合法性有着深刻影响。党员群众还是党密切联系非党员群众的直接沟通载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既然是过程就意味着有阶段性和风险性，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即为这种阶段性和风险性的体现。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革命史具有亲缘关系，在学习中国革命史中要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中国革命史，首先要注重学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中国社会的特点，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善于把党和人民取得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发展理论的创新精神；学习他们善于运用民族语言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回答和阐明中国革命理论和政策问题的理论方法。”^①

二、对本研究中几个相关问题的说明

1. 本研究的历史阶段定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1921—1928年）”为题蕴涵了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诞生。正如上述所言，尽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存有“相结合”思想了，但根据当时的

^① 胡锦涛：《学习中国革命史发扬光大党的传统》，《光明日报》2006年7月6日。

历史材料来看,这种思想仅仅停留在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里,还没有赋予实践运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运动还没开始。这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二是“早期探索”这一说法的依据。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将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称为幼年时期。^②故此研究将其视为“早期”。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总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紧密相连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化主要体现为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转换。尽管中国革命史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时间段划定为1921—1927年,但这个时间段里只是讲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中的第一次胜利和失败,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新道路却是在1928年之后开辟的。因此,“早期探索”的历史时间段在本研究中划为1921—1928年。

2. 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因此,本研究试图梳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展开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认识由浅入深。“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总之,“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但“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③从文献资料看,早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1页。

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关注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即对“化”的机制作了深入探讨，而国情又始终是这一探讨的基点。如，中共渐次提出了社会革命（中共“一大”）、民主联合革命（中共“二大”）和国民革命（中共“三大”），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符合中国实际。对待工人运动实情的认识也渐次深刻：鉴于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少的事实，中共提出职业工人大联合思想，同时发动农民运动。“城乡两条腿革命”始终是中共的策略，因此，既是在城市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农村也在摇旗呐喊；既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还未成燎原之势，城市工人运动也是暗流涌动。

另有，这个时期基于革命道路探索形成了“找”与“送”的张力。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详细分析了自1840年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坎坷历程，并认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从文献资料的梳理上看，自1899年始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了。毛泽东在此的意思实际上蕴涵了经俄国人介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于自1899年之后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俄国人介绍来的，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几乎没有产生影响。^②同时，笔者还以为，当时“送”来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三哲”^③来华传经布道。中国人“找”是为了救国，那么西方人和俄国人“送”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是人道主义关怀，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其“送”另有目的。通过对这个时期国际关系史的考察发现：俄国的十月革命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企图，遏制和扼杀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当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羔羊，反遏制扼杀是其生存的本能要求。因此，地缘政治使中国重要了起来，莫斯科虽有追求世界共产主义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② 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③ 这里的“三哲”是指杜威（1919年4月来华传授其实验主义）、罗素（1920年9月来华传授其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泰戈尔（1924年春夏来华传授其东方文化主义）。

理想，但民族利益也是其目标。莫斯科用中国牵制西方，就像西方利用中国牵制莫斯科一样。^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张力”局势。物理学上的“张力”意为分子之间的引力。如果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为“分子”的话，那么在这“四分子”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并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部分。这里主要探讨的是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张力”：莫斯科需要中国共产党为其开辟面对西方国家的“缓冲地带”；中国共产党需要莫斯科提供救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物质帮助（这种互需也可用“引力”来描述）。尽管这种“互需的张力”是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语境中展开的，但其间仍然凸显了民族利益的重要性。正是这种“互需的张力”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深深打上了莫斯科的烙印。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凭借自己坚韧的品格和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对“走俄国人的路”的反思中独立自主地探索开辟了走中国自己的路，这即为主旨。

3. 本研究内容的逻辑架构。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秉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范式，共分五章进行分析。第一章考察了“五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鉴于“五四”时期思潮汹涌的境况和中国共产党在“五四”之后旋即成立的事实，该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然后将目光聚焦在对“新”青年们（相对没有接受“科学与民主”新思想的青年们而言）有重大影响和对建党有直接推动作用的“南陈北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上。可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在当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本章还以为，从这个时期的几次大辩论中也可以看出“五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认知直接关系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章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诞生。本章首先界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主体。这种界定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范畴，如“目的

① 莫斯科早期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牵制西方，特别要牵制日本；后来援助中国共产党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援助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以牵制西方。杨奎松将中国革命称为“中间地带”的革命不无道理。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